

# 不可逃避的国家权力

——读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

陈周旺\*

现代国家的兴起,也许是现代化的宿命。它不仅是现代化的产物,也是现代化的推动力之一。布罗代尔曾经指出,资本主义其实就是国家加上市场。<sup>①</sup> 查尔斯·蒂利对布罗代尔推崇备至,他更指出,“国家”就是现代性的支柱,<sup>②</sup>而现代化区别于过去所有时代的特征,就是产生出了一个全新的现代国家,而什么市场、公民组织之类的,在现代之前均有其雏形,并不是什么全新的东西。

当现代国家发展到今天,已经历了数个世纪,套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一切的变化都是让它更加完善。换言之,国家作为资本、强制两种权力的“容器”,正在越来越游刃有余地进行资本集中和强制集中两个进程,以至于蒂利站在 21 世纪当口回首往事的时候,不禁发问:我们到底应该强化国家,还是弱化国家?<sup>③</sup>

强化国家,自不待言,是让国家持续累积它的权力;弱化国家,听上去很美,但蒂利警告说,我们也许会在弱化国家的道路上见识伊拉克。在美军步步逼近,萨达姆总统明知无招架之力的时候,他果断地采取了一个后现代的创举:共和国卫队自行解体,将国家长期垄断的暴力卸载到民间。这场极致现代与极致后现代之间的

---

\* 陈周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① 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顾良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第94页。

② 蒂利:《重建欧洲的生活》,载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77—278页。

③ 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魏洪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52页。

古怪战争,以美军被拖入伊拉克四处蔓延至街角的暴力泥淖为终局,也许还没有终局。

其实何尝只是蒂利有此困惑?对于国家权力的作用,向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第一种立场就是所谓“力挺派”,认为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社会合作,改善了人类的生活。倘若没有国家,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大概还只能停留在地方、邻里的有限空间里。水利灌溉、打击犯罪、公共卫生工程等等重大项目,只能由国家来执行。持这种观点的,不仅包括诸多学者,也包括各国政要、联合国官员,等等。弗朗西斯·福山<sup>①</sup>和潘基文等,皆属此列。

另一种立场当然就是“反对派”。他们认为,现代国家野心勃勃,一心向社会扩张自己的力量,往往喜欢根据自己的偏好,去推行一些宏大的工程项目,这些项目是相当程度上破坏了社会内聚力和传统社区的社会网络,削弱了原本就存在的一些社会合作。城市拆迁、滥伐山林、填海造地,均是以人文和自然环境的破坏为代价。持此立场的,除了一些民间人士,学者群体当中,以雅各布斯、詹姆斯·斯科特<sup>②</sup>最为著名。

批判现代国家,是耶鲁大学人类学教授詹姆斯·斯科特最近十年的研究主题。得益于译介者的努力,斯科特这几年在中国学术界已经是尽人皆知,有人认为他在中国的名声甚至远胜于在美国本土。

斯科特以思想睿智、言辞犀利、见解独到著称。由于他与当前量化研究一统天下的政治科学局面格格不入,其理论又颇具杀伤力,一批以“Mr. Perestroika”为名的政治学反潮流者,以公开信形式反对理性选择理论的霸权,竟拥戴斯科特为美国政治学会主席,使之不幸“躺枪”,难免被怀疑是幕后黑手。在中国,斯科特被誉为

---

① 参见福山:《国家构建》,黄胜强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② 参见斯科特:《国家的视角》,王晓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反现代性的先锋”“抗争理论的巨擘”“道义经济学的始作俑者”，至少有三件黄袍加身。

虽然厕身耶鲁大学人类学殿堂，不过斯科特“不像”我们通常所熟悉的那种人类学家，尽管研究对象多为诸如马来亚“异邦”的农民，叙事方式却非典型的偏远部落民族志风格，而反求诸己，借非西方文化实践促成对现代性铁板的反省。斯科特使过去略显封闭的人类学叙事走出画地为牢的怪圈，加入社会科学的对话之中，成为反抗现代性话语霸权的利器。

斯科特并不故作高深，相反很接地气。他只是喜欢剑出偏锋，作惊人之语；其实他也不是真的“走偏”，而只是我们这些被现代性洗脑的读者不习惯他的“纠偏”。为了纠现代性之偏，斯科特不得不彻底执行“反其道而行”的策略。这种思维方式，在他早期的《比较政治腐败》一书中就初露端倪。这部著作是集一众新锐比较政治学者包括诺德林格等在内的“比较政治丛书”中的一部，也是学术观点最为另类的一部。斯科特一反常态，摒弃人类学的“文化”本位，坚称政治腐败与文化无关，因为所有文化中都有腐败的种子，不存在东方社会的文化特征更助长腐败之说。至于结论就更离奇，斯科特认为腐败成本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达而提高，而变得更容易治理。<sup>①</sup>

如果《比较政治腐败》还算中规中矩，接下来的“道义经济学”对“经济理性”（《农民的道义经济学》），“日常化抗争”对“动员-抗争”（《弱者的武器》），“地方性实践”对“宏大现代性计划”（《国家的视角》），“隐蔽文本”对“公开文本”（《支配与反抗的艺术》），这种“反其道而行”的逆向思维方式，屡试不爽，且愈演愈烈，终至炉火纯青。斯科特独步天下的这种“武功”，简单说来就是，我们只要找到现代性一个可大可小的“梗”穷追猛打，再提出一些相反的事实，

---

<sup>①</sup> 转引自刘擎：《愚而未决的时刻》，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十二章第一节。

建立基本的理论命题,便可成一家之言。在这种套路中,对于实证材料的取舍是最为关键的,必须有意识地选取有利于己方的证据,对于那些不利的材料,则要坚决除之而后快,决不能拖泥带水。我们之所以不能成为斯科特,就是因为我们在取舍上往往犹豫不决。除了对手边素材恋恋不舍,深受现代性之荼毒而缺乏彻底反现代性的意志,亦是其中原因。就此而言,斯科特能将现代性/反现代性的二元对立思维舞弄得出神入化,绝非泛泛之辈可以企及。

斯科特对国家权力的忧思,由来已久。作为一名人类学家,对于守护地方性知识有天然的使命感,跟拥有庞大国家机器形象的利维坦过不去,是情理中事。早在《国家的视角》一书中,斯科特便奠定了他的反现代国家立场,认为国家对于“明晰性”的追求,扼杀了地方性知识的经验杂多,这是国家以基层社会为代价来推进其社会改造计划的一条不归路。“国家的视角”,其实是一种揭露,将隐蔽在日常生活中不为人所察觉的国家权力披露出来,指出这些已经让我们习以为常的事情,其实是国家权力处心积虑操纵的结果。

这样的见识已经足够惊人。不过斯科特似乎并未满足,积淀多年,一面给耶鲁学生讲授一门命名为“水”的课程,一面继续攒力批判国家,集大成之作便是这部《逃避统治的艺术》。该书甫一问世,便誉满天下,斩获各种学术大奖,包括亚洲研究最重要的奖项费正清图书奖。

在《逃避统治的艺术》一书中,斯科特不再将批判火力局限于现代国家,而是扩展到一切权力形式,凡有统治之处皆有扭曲,有扭曲之处则必有反抗。逃避统治,也是反抗的一种手段。书中讲述的,是一个叫做“赞米亚”的地方,这个东南亚大陆山地在地域空间上横跨了9个后来成为民族国家的政权的疆域。由于它处于中央集权的边缘,基本上是统治权力鞭长莫及之地,遂成为逃亡者、流放者天然的避难所。2000年来都不断有人为了逃避赋税、惩

罚、劳役和征募逃到这里来,赞米亚成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天堂。即便到了现代国家时期,国家权力已经宣告无远弗届,赞米亚依然顽强地存在着,成为一个象征。

斯科特集中考察了这些从统治中逃离的人的社会组织、谋生手段以及他们通过世代传承逐渐形成的社群文化。一方面(意识形态的一面),他们被官方诋毁为“野蛮”“犯罪”;另一方面(真实的一面),他们在摆脱了统治之后,过着温情、平等、互助的乌托邦式的自然生活。<sup>①</sup> 斯科特的观点十分直截了当:统治,特别是人为的、集权的统治,并不是真正的人类需求,从这些统治中摆脱才是。在斯科特笔下,统治虽然是一个悠久的事实,更多则是现代性的隐喻,它是被别有用心地谋划出来的。这场谋划,从霍布斯的“利维坦”中可以看到端倪。霍布斯认为人的共同生活的维系,无法脱离一个戴剑的“主权者”的统治,其后的政治设计,只不过是对于这个统治者披上诸如民主这样的外衣而已。现代世界最终将沦为一个“大牢笼”(马克斯·韦伯语),逃避统治不仅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简直就是不可理喻,当然也被主流话语所忽略、拒斥,用斯科特的话来说,这是国家对逃避者充满敌意的“污名化”。<sup>②</sup>

事实上,赞米亚是逃避者“精心设计”出来的庇护所,在山地所形成的一切都与国家构成了鲜明对比。斯科特声称:“在很大程度上,这些人群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组织都是为了逃避被统合到国家结构中而做出的策略性适应。”这就是所谓“逃避统治的艺术”。<sup>③</sup>

为了论证这一点,詹姆斯·斯科特选择了“水稻国家”作为案例。对水稻种植的描述,应该说是熟识马来亚乡村生活的斯科特的拿手好戏。他首先指出水稻生产与生俱来的集权统治特征,而流亡者们,即便遇到有合适气候、土壤和水源的地域,却依然选择

① 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王晓毅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前言,第2页。

② 同上书,第11页。

③ 同上书,第47页。

了赞米亚山地作为他们的居所,重新开发出一种与水稻种植不同的谋生手段——采集和狩猎,尽管要艰难得多,但可以摆脱对稻米的“组织性”的依赖。因为采集和狩猎需要不断移动,这种生存方式就不可能走向水稻种植的集权。斯科特指出,那些专门从事采集的人群一定是居住在远离国家权力的地方,同时也挫败了现代国家对人口和食物进行征收的计划。<sup>①</sup>

毋庸说,这些论述新奇且异端,启人疑窦,但少有人能拒绝其反国家主义的诱惑,有一种终于从柏拉图的“洞穴”中走出的快感。不过,平心而论,从《国家的视角》到《逃避统治的艺术》,斯科特的“反其道而行”,走得太远了。

不错,在此,斯科特还是那个斯科特,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这里借用蒂利的说法,他曾经批评某位学生的习作,说它“像一艘大船,但是每个螺丝都没有拧紧”。前已述及,斯科特的立论,凭的就是剪裁材料的巧夺天工,螺丝没拧紧是题中之义,但较之以往的作品,《逃避统治的艺术》要处理的统治/无统治二元对立问题更宏大、更根本、更难以驾驭,螺丝就更容易松脱。

沿袭斯科特常用的思考方式,那些属于我们日常经验范畴的,有可能恰恰是真正被我们忽略的,而不是那些脱离我们日常经验的行为。表面上,《逃避统治的艺术》是对斯科特一贯理路的继承,细思之下却不啻是一场背叛。诸如“弱者的武器”“道义经济学”等,都是在挖掘我们日常经验中不为人知的一面的意义,亦即日常经验中反理性的一面;《逃避统治的艺术》则是汲汲于对日常经验的逃离。两者当然不可相提并论。

置身于某种统治形式之下的大多数,在斯科特笔下,就成为缺乏反省能力、甘心被现代性奴役的自甘堕落者,显然不同于那些在理性化控制之下仗仗自然本能进行“日常化抗争”的马来亚农民。

---

<sup>①</sup> 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第84页。

赞米亚之外的空间,人们如何逃避统治呢?是不是只有在避无可避的情况下逃避了统治,才配得上斯科特所说的“艺术”呢?原本的斯科特,不应该费心去找一个什么“赞米亚”,而应在这群自甘堕落者中发现逃避统治的“艺术”。

退一万步,由于赞米亚这个空间的存在,逃避统治者,也不是真的在逃避统治,而只是逃避某个人、某个集团的特定的统治。斯科特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当这些逃避统治者聚集在他们的天堂赞米亚,为了组织他们的生产、抵御外部侵扰、克服自然灾害,最终还将建立起某种统治形式,“自我生成国家”。<sup>①</sup> 如果水稻种植充满了统治色彩,那么其他生产方式也是一样,有过之而无不及,游牧部落通常都高度集权。换言之,统治是不可以逃避的。

这样一来,与波普金“理性的小农”争论不休的斯科特,还必须面对一个关乎“理性”的问题:逃避统治,到底是“理性”还是“天性”,是发自人对自由的“自然”追求,还是理性计算的结果?逃往赞米亚的难民,也许是出于某种利益,经过成本-收益考量之后,选择逃离原来的统治。比如,他们要么是在原来体制中触犯刑律,要逃避惩罚;要么是过得不够如意,想换个活法;要么是觊觎新的资源,等等,都可以构成出逃的动机。如果“动机不纯”,那就是理性选择。出走成为一场“精心设计”的行为。这种理性的计算,恰恰是现代性为我们构造的一个大陷阱。从这个意义上,逃避统治并非人类的天性;相反,接受统治才是。

可以说,詹姆斯·斯科特一直循反现代性之道而行,不过这一次他找错了对象,反而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将统治作为现代性的隐喻固然是斯科特一贯策略,但要害之处在于,统治不仅不是现代的产物,而且是人类再古老不过的现象,古老到它本身甚至是反现代性的,亦未可知。如果是这样的话,斯科特虽然还是那个锋芒

---

<sup>①</sup> 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第11页。

毕露的斯科特,但只是虚有其表,即使在远离现代国家的赞米亚山地,统治也是避无可避的。

---

Unavoidable State Power — Book Review of  
James Scott's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